

略论《暴风骤雨》的创作特色

田 美 琳

周立波同志是我国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勤奋的战士，他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作品。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同志重要的代表作，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所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暴风骤雨》也是作家创作的一大突破。它以东北农村的生活斗争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农村翻天覆地的土改运动。真实地再现了广大翻身农民所经历的尖锐、剧烈、复杂的斗争；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它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广大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提高思想觉悟，以暴风骤雨般的力量，摧毁长期统治我国农村的封建势力的伟大斗争。

《暴风骤雨》是我国最早一部反映土改运动全过程的优秀长篇小说，曾获得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奖金。

扎根生活实践，质朴、真实地描写人物形象

从实际生活出发，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上，创造人物形象；不拔高生活，不神化人物，力求塑造质朴、真实、自然的典型性格，这是《暴风骤雨》一个突出的创作特色。

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文艺路线，炮制阴谋文艺，把文艺的真实性同倾向性对立起来，用所谓的“革命”倾向性，实际上就是用他们反动的政治阴谋、意图，取代文艺的真实性，制造脱离生活、背离群众的虚假的“造神文学”，给文艺事业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打倒“四人帮”之后，现在，有些人又用真实性来否定文艺创作应有的革命的倾向性和美学理想，忘记了文艺的使命，丢掉了革命作家的责任感。然而，早在三十多年前，创作《暴风骤雨》时，周立波同志就非常重视在生活和创作的实践中，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创造既扎根于肥沃的生活土壤，又蕴含着倾向、理想的丰美的人物性格。

周立波同志积极地投身火热的土改运动，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交朋友”的方式，和“探贫访苦，扎根串连的工作方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深入了解群众，他心里积攒了许多“人谱”，有一本本各种各样贫苦农民的血泪帐。他还点起豆油灯，和屯里的男女老少坐在热炕上。吧着旱烟袋，“唠闲嗑”。^①因此，在他的头脑里，储有大量生动的生活故事和景物。正是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实践中，周立波同志获得了对生活的真正认识和理解。把握了深深扎根于生活实践的革命的思想和美学理想。早在1952年，他就带着深深的感触说：“工农兵中间的英雄人物，都是聪明精干、正直无私、勇于负责、坚定不移、不怕牺牲的，都是体现着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道德精华，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纯

洁、优美和坚韧的英雄人物。”^②这样的认识，他从来也不在自己的作品中，让英雄人物空发高论，进行教条主义的说教。《暴风骤雨》里的主要人物，之所以具有质朴、真切、自然的性格美，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以赵玉林这个典型形象为例，据周立波同志说，这是一个“综合的典型”。为了塑造这个体现自己美学理想的典型，作家从尚志选取人物原型，选取打胡子的故事和屯落的风貌；从五常搜集斗争恶霸地主，和赵玉林英勇牺牲的悲壮剧的材料。从这些实际的生活素材出发，他放眼到生活历史的深处，表现赵玉林一家的生活遭遇和命运。作品写他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一年到头，顾上了吃，顾不上穿”，在十冬腊月里，一家人除了抱柴、挑水、做饭外，“都不下炕”；写他妻子被生活所逼，经常沿街乞讨，女儿也被活活饿死；还写他当劳工逃回后，韩老六罚他跪碗碴子，鲜血滴了一地。这样的真实描写，生动地说明：赵玉林是带着旧社会痛苦、悲惨的切身遭遇，走到新社会来的。他同地主封建势力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此，就极容易接受党的土改方针、政策，跟党走上一条坚决斗争的道路。

在此基础上，作家还进一步写了赵玉林的现实表现：在工作队发动、组织的第一次忆苦会上，当老孙头、老田头、刘青山心存疑虑、害怕地主报复，悄悄溜走时，是他“从桌上跳下”，把“短烟袋别在裤腰上”，敞开胸膛，露出伤痕，诉说了一家人的苦，启发、教育阶级兄弟；点燃了乡亲们仇恨的烈火；是他在工作队的支持下，带领群众，抓了韩老六。作家还集中、概括地描写了赵玉林的大公无私和阶级友爱。例如，他对小猪馆的营救和收养。他对郭全海的收留和照顾。郭全海情知他生活困难，说我“到你家吃啥？”老赵朴实地回答：“还有一斗多糠子，吃完再说。有我们吃的，反正饿不了你。”分胜利果实，他把自己列为三等三级，妻子诉说自己家生活的艰难，赵玉林耐心地开导“能对付穿上，不露肉就行。‘满州国’光院，也能过呀。”“老百姓都有了，咱们就会有的。”就是在这些生动、自然的描写里，我们看到的赵玉林，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人。是活生生有血有肉、可供大家学习的具体人物形象，而不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神”。

但是，在这些表面平凡的描写里，又是体现着作家的思想倾向和美学理想的，周立波同志既从生活真实出发，又不局限于生活的真实，他在美学理想的指导下，又认真地加工、改造了生活真实。如果用生活的真实，特别是用生活存在的事实，去排斥思想倾向、美学理想，那就只能损害艺术的真实，甚至掉进自然主义的泥坑。

象赵玉林这个典型，就明显地借用了花玉容和温风山这两个生活的原型。但是，作家对生活的原型，进行了认真的挑选、加工和改造。抛弃了花玉容得伤寒病死的事实，而加工、改造了他作为打胡子的英雄的一面；对温风山因公外出，被地主枪杀的偶然事实，则改造成，因保卫胜利果实，而在打胡子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经过这样的加工、改造，对深刻揭示赵玉林崇高的思想精神境界，渲染屯里群众对他的深情追悼和怀念起了很好的作用。

精确地刻划个性，全面地展示土改生活

要想反映波澜壮阔、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以及它对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性格心理引起的深刻影响，不描写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个性和人生遭遇，那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周立波同志十分看重在生活实践里，在和群众相处的交往中，发现和捕捉那些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事件和生活细节，然后经过改造、加工，生动地表现出来。他说：“在土改期间，

我曾留意，家有两匹马的中农和只有一匹马的中农对土改工作队的态度，他们的心理，谈吐和要求，都不一样。如果不细心，他们中间的差别就会溜过去，描写出来的中农就会没有个性，流于一般化。”^③人的个性的形成，当然有先天的因素，有气质方面的原因。但是，它主要的还是由人们各不相同的出身、经历、阶级地位、生活环境、人生道路等等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社会生活斗争的实践决定的。因此，描写鲜明突出的个性，表现各种不同的思想性格，不同的人生遭遇和命运，才能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揭示土改运动的伟大意义，及其对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同志就用他那雕刀一样的笔，线条分明地刻画出了赵玉林、郭全海、老孙头、白玉山、赵大嫂、白大嫂等等，各不相同的人物性格。象车把式老孙头，就是一个从旧社会长期生活过来的人物。他走南闯北，经历多，见识广，有智慧，爱表现，说起话来诙谐、幽默、意趣横生。他走到那里，就把愉快的欢笑带到那里。他懂得许多象“诸葛亮借东风”、“樊梨花移山倒海”那样的典故，会讲不少富有生活哲理意味的故事。富农李振江假装积极，打了韩老六一个耳光，他一眼就能看穿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群众搜查韩家大院，韩老六的小老婆装死、耍赖，自卫队一时慌了手脚，他假戏真演，抡起手中的榆木棒子，喊道：“大伙都闪开，棒子抡上了！”结果吓得她慌忙站起，又立即跪下，不住地求饶。然而，老孙头毕竟从旧时代走过来，身上难免沾染一些小生产者的落后思想。他有时看风转舵，圆活世故、好为自己打算。分马时，他怕老王太太换走自己心爱的好马，就变着法子说它这不好、那不好，好让别人不换，留给自己。老孙头是作家笔下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

恩格斯指出，要对典型人物“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不但写出他“做什么”，还要写出他“怎样做”。人物做什么，他的目的、动机，可能是一样的、相似的。但是，“怎样做”，则必定是切合着人物特有的思想、性格、心理、气质，总之，是切合着人物的个性进行的，因而，是千差万别的。精确地描写人物“怎样做”，是刻画鲜明、突出个性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赵大嫂一生跟丈夫在艰难困苦中过活，是一个“吃尽千辛万苦，也不抱怨的好心眼的女人”。作家用含蓄、蕴藉的笔触，描写她质朴、温厚的言谈、举止，着意刻画她那坚韧、贤慧、善良、温顺的个性。在赵大嫂的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中国劳动妇女吃苦耐劳，不抱怨人生命运的传统美德。她即使是在严酷的处境下，也决不丢掉劳动人民的骨气，失掉“庄稼人的本分”。赵玉林牺牲后，她学习丈夫的优秀品质，“屈己待人”，宁可叫亲生的儿子在冬天里光着脚丫，也不让小猪宿冻了脚。她给他穿上棉鞋，送他上了小学。

白大嫂则不同。她耿直豪爽、见义勇为、乐于助人。作家用泼辣、粗犷的笔触，抒写她敢说敢做的性格。童养媳刘桂兰受欺压，他抱不平，主动接到自己家，并且说：“刘桂兰是我收留了，谁敢来抓，叫他来，咱跟他豁上！”她带头“整地主、挖金子、起枪枝”；揭露篡了农会领导权的张富英吃喝玩乐、为非作歹。

《暴风骤雨》在塑造典型性格时，非常重视把典型的共性和个性辩证地统一起来。一方面，用鲜明、突出的个性，精确地真实地表现共性，生动地体现典型性格蕴含着的深广意义；同时，又用共性，用深广的社会、思想意义，来深化、凸现个性，使个性不致流于平庸化。

重视描写矛盾冲突，努力揭示人物精神世界

在巨大的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崇高的思想品质、精神世界；又借一般的生活事件、刻画人物的感情、心理、个性和气质，从而创造充实、丰满、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这是《暴风骤雨》的第三个显著特点。

周立波说过：“在运动和斗争中可以深刻了解各种各样的人。在这种时候，每个人从他的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出发，都会充分地表露各自思想和感情，提出各自的观点和要求。阶级矛盾和内部冲突也特别地尖锐、复杂和曲折，并突出地集中地表现出来。”^④这里，他虽然讲的是进入创作过程之前，作家观察、认识、理解生活和人物的情况；但，毫无疑问，它也适合创作过程中，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

《暴风骤雨》在表现最初的发动群众，斗争地主中，就非常重视揭示刘胜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冷热病。他顺利时，头脑发胀、冲动；遇到挫折，又消极、悲观、灰心丧气。肖祥则恰恰相反，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思想敏锐，善于在尖锐、剧烈的斗争面前，保持冷静的头脑，注意斗争策略，妥当地分析、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他目光长远，对胜利满怀信心。白胡子在斗争会上玩弄转移斗争目标、釜底抽薪的阴谋诡计，肖祥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鉴于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就立即决定结束斗争会，把韩老六放掉。这是因为考虑到：韩老六“他正得意，还盼我们跑呢”自己决不会跑；工作队不能包办代替，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发动起千千万万群众，由他们自己起来，把“封建堡垒干净全部彻底摧毁。”可是，这种思想认识和斗争策略，当时并不被刘胜和小王理解。刘胜在暂时的挫折面前，要卷起铺盖，撤回哈尔滨；小王怀疑、气忿肖队长“跟地主要协”。正是在这种严重、尖锐的敌我冲突、内部矛盾中，作家深刻、有力地揭示了肖祥的深谋远虑、灵活机敏和善于耐心说服，教育同志、启发引导战友的优秀思想品质。

《暴风骤雨》精心描写打胡子的斗争，主要目的就在于借它表现时代生活气息，揭示人物崇高的思想、精神境界。面对韩老七带领一百多个匪徒，窜犯元茂屯，反攻倒算，妄图夺回胜利果实的严峻现实，周立波同志用饱蘸深情的笔，激情满怀地写了被土改运动发动、组织起来，提高了阶级觉悟的广大贫下中农。特别是赞颂了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胜利果实的赵玉林的崇高思想品质、勇敢壮烈的牺牲精神。作家说：“我为什么要把他的牺牲写得那样详细呢？这是因为描写一个革命干部的英勇壮烈的牺牲，以及由此引起的农民的觉悟和怀念，可以教育新中国的年青的一代，让他们学习革命先烈的崇高品格。”^⑤叛徒江青说这样写，是“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让英雄无谓死掉。这是不懂装懂，是出于险恶用心的诬蔑。

周立波同志为了塑造充实、丰满的人物形象，还常常借助一般性的生活事件所掀起的思想、感情、情绪的波澜，生动、细致地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

参军是对翻了身的农民的另一种考验。如果说，尖锐、剧烈的斗争，揭示了郭全海的立场坚定、不受拉拢、腐蚀、精明强干、大公无私；那么，参军则又考验了他在翻了身，娶了媳妇，有了温暖的、家庭，过起了幸福的生活后，如何对待参军、支前，彻底消灭反动派，从根本上保卫幸福的生活的问题。郭全海面对着家家“漆黑的柴火堆得高高的，户户屋顶上“飘起了淡白色的炊烟”的幸福生活；面对着刘桂兰真挚、温柔、体贴的爱情，经过

思想斗争，终于把个人的利益、幸福放在次要的地位，而毫不犹豫地服从革命斗争的需要。通过参军所产生的细致的思想斗争、转变过程，作品很好地揭示了郭全海丰富、复杂、而又高尚的内心世界。

鲜明的地方色彩，浓重的生活气息

周立波同志善于细心体察，透彻理解生活和人物，善于准确把握事物的特点，进行贴切地描写，他写那个地方的人，象那个地方的人；写那个地方的生活，象那个地方的生活。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是个表现地方特色的能手。

《暴风骤雨》的浓厚地方特色，使别地方的人们，读起来感到新颖、独特、别开生面、耳目为之一新。鲁迅说的艺术作品的地方色彩，能使它增加一种特有的“美和力”，“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扩眼界，增加知识的。”^①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暴风骤雨》的地方色彩，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斗争的社会环境及其特点，精确地从现实和历史的生活发展中，刻划土生土长的人物性格。

老孙头的性格、心理、气质，就是在东北地区长年累月赶三匹马拉的四轱辘大车的特殊生活中形成的。

赵玉林的性格、心理素质，又和他在东北一生的经历分不开。旧社会他被地主残酷剥削、压榨，穷得连下地干活，都“光着腚”；他四次被韩老六派去当劳工“头趟还没有回来，二趟就又派上了。回回劳工，数牡丹江那一回蝎虎，二十天，二十宿，没有睡觉，一天吃两顿橡子面，吃了肚子胀，连饿带冻，死的人老鼻子啦。”这种受剥削、受压迫的历史遭遇，是具有东北地区的特点的。赵玉林后来在土改运动中的一系列表现也是如此。

第二，准确、贴切地描写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突出的地方风物，往往能够鲜明地体现地方特色。例如，李大个子逃避劳工，一大早就跑了，结果“屋里空空荡荡，光剩下一双破靰鞡，一个破碗架。”这靰鞡，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代表东北地区生活的。斗争韩老六的那个金色的秋天，“家家户户窗户跟前，房檐底下，挂着一串串的红辣椒，一嘟噜一嘟噜的山丁子，一挂一挂的红菇蕻，一穗一穗煮熟了留到冬天吃的嫩苞米干子。”这样的描写，就使作品充满东北特有的农家风情、生活气息。

打败胡子进攻的第二天，屯子里欢庆胜利，作家逼真、生动地描写了一幅东北独有的社会生活风俗画：“噙着烟袋的妇女，光着脊梁的小嘎，喇叭吹着《将军令》”，张景祥扯起哑嗓，摇着呱打板，唱“二人转”《卖线》，唱《摔西瓜》“……蹦了一对螃蟹跳了一对虾，摔坏大西瓜，嘎呀。”一个地方的社会风俗习惯，是在那个地方的长期生活实践中，结合着当地人们的传统，一代一代因袭下来的。它适应着人们的兴趣、爱好、习惯而形成，反过来，又培养着当地人们的兴趣、爱好和习惯。因此，深入地了解社会风俗习惯，准确、生动地表现它，非常有助于加强作品的地方色彩，从而使作品更好的联系生活，联系群众，充分发挥它的教育作用。

第三，运用富有东北地区特点的语言，（包括方言土语）描写生活，刻划人物。

为了创作《暴风骤雨》，周立波同志曾下苦功，自觉、积极地学习富有东北地区特点的语言。他深知“语言是文学的表现手段”。作品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写啥象啥，就必须下

斯汤达和他的《红与黑》

俞 灏 东

斯汤达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对世界和欧洲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巴尔扎克称他是“观念文学最卓越的大师之一。”托尔斯泰在谈到对战争题材的处理时，曾说“我的第一个师傅是斯汤达。”

斯汤达原名玛丽—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生在法国南部格勒诺布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法国历史上充满了革命风暴的大动荡时代。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就是由无权的第三等级（由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组成）奋起反对和推翻由教士和贵族（他们分属于第一和第二等级）掌权的封建专制政权的一次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从小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极端憎恶封建专制政权。他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欢欣鼓舞，並以雅各宾党人自居。

1799年，斯汤达追随拿破仑大军，远征意大利，体验了军事胜利和人民解放的欢乐。1812年，他又追随拿破仑大军，深入俄罗斯，饱尝了法军撤退和溃败的痛苦和辛酸。1814年，拿破仑垮台，波旁王朝复辟后，他极度鄙视波旁王朝，怀着“根本不想重见被波旁王朝玷污了的巴黎和法国”的心情，远离祖国，侨居意大利，开始从事写作。1817年，他用各种笔名发表了《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游记》、和《海顿、莫扎特和梅达斯泰斯的生平》。斯汤达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游记》上。以后，他就一直用斯汤达作自己的笔名。

1821年，斯汤达由于同情意大利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被奥地利警察驱逐出境，回到巴黎。1823年，他发表了《拉辛与莎士比亚》的重要文艺论著，它被公认为是浪漫主义（实质是现实主义）的一篇檄文，提出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为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1827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斯》，这部作品虽然对法国的社会现实作了充分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还不够成熟。后来，他经过对法国社会

苦功夫，学习和积累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

周立波同志说过，《暴风骤雨》是想用农民的语言来写的，而且，是想用大量富有特点的语言（包括方言土语）来写的。这在他“是一种尝试”。实践证明，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注：①③④周立波：《深入生活、繁荣创作》《红旗》1978.5.

②周立波：《谈思想感情的变化》《文艺报》1952.11月.2号

⑤周立波：《暴风骤雨创作经过》、《创作经验漫谈》人民文学出版社

⑥鲁迅：《致罗清楨》《人民文学》1978年2期。